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七期／民國 95 年 3 月／頁 1～40

越南共產黨政治局之研究*

梁錦文**

摘　要

越南共產黨政治局是越南政經決策的核心，也是越南事實上最高的權力中心，其成員的構成方式常是研究越南政經決策所關心的對象。因此研究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的組成方式，有助於吾人對越南政經決策的瞭解。然而一九八六年以前越南官方不易將其文件公開，故研究上有其困難。

本研究是以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爲研究對象，利用越南共產黨公佈的檔案文件，以及其他資料，作較爲全面的研究。首先探討其在越南政治決策上的地位，再分別從政治局委員的組成，研究其職務、出身背景，以及地域分佈的安排，尤其著重其變動以及對政策之相互呼應，以便對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的深入瞭解，進而使吾人更能掌握越南未來政經的走向。

關鍵詞：越南、共產黨、政治局、革新

* 本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不少寶貴意見，作者在此敬申謝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e-mail: kmleong@ncnu.edu.tw。
收稿日期：93 年 9 月 13 日；通過日期：95 年 2 月 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一九四五年越南獨立以來，越南共產黨（*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一直都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七六年以前稱爲越南民主共和國，以下簡稱越南）之執政黨。[1] 由於越南共產黨在越南政治中有其特殊地位，再加上蘇維埃體制國家的「以黨領政」，是故越南所有政策都來自共產黨。[2]

實際上越南共產黨最高的決策機構便是政治局（*Bộ Chính trị*，以下簡稱爲「政治局」）。然而越南共產黨於一九三〇年二月三至七日在香港九龍成立時，並無政治局之設。[3]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至三十一日在澳門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一大一中全會」，餘類推）舉行時，仍沒有政治局的設置，只有當時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委員 13 人，其中常務委員 9 人，候補有委員 4 人，例如黎鴻峰（Lê Hồng Phong）、丁昇（Đình Thanh）、武元賢（Võ Nguyên Hiến）、何輝集（Hà Huy Tạp）、馮志堅（Phùng Chí Kiên）、黃廷同（Hoàng Đình Giong）、阮愛國等人都是其中的委員（Nguyễn Trọng Phúc, 2003: 108）。直至一九五一年二大時政治局才設置成爲越南共產黨的組織（Pham Hong Linh, 1984）。

不過，從二大以來，政治局成爲越南政治真正的決策核心，是故對越南政治局的研究，對吾人瞭解越南政經決策有其一定的價值。

本研究是以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爲研究對象，首先探討其在越南政治決策上的地位，再分別從政治局委員的組成，研究其職務、出身背景，以及地域分佈的安排，尤其著重其變動以及對政策之相互呼應，以便對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的深入瞭解，進而使吾人更能掌握越南未來政經的走向。

---

1 該黨名稱於 1931 年 10 月一大時改稱爲印支共產黨（*Đong Doung Đảng Cộng Sản,* Indochinee Communist Party）、1951 年二大改稱爲越南勞動黨（*Đảng Lao Đong Việt Nam*），直至 1976 年 12 月 14-20 日四大時又改稱爲越南共產黨。本文爲了行文方便，一律以越南共產黨稱之。

2 由於嚴格來說「越共」（Viet Cong）是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是故不能將「越南共產黨」稱之「越共」。有關「越共」的資料及研究，可參閱 USCIA (1966)；Pike (1966)。

3 當時的出席者包括「共產國際」（Comintern）代表阮愛國（Nguyễn Ái Quốc，即胡志明）；印支共產黨代表鄭定舉（Trịnh Đinh Cửu）、阮德剛（Nguyễn Đuc Cảnh）；安南共產黨代表阮紹（Nguyễn Thiệu）、周文廉（Châu Văn Liêm）等人。參閱 Nguyễn Trọng Phúc (2003: 4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文獻回顧與分析架構

吾人首先對越南政治局研究的文獻，加以回顧，檢視本文主題的原始性，同時也可以瞭解本研究的困難度。然後再以前人的研究作爲基礎，來建構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一、文獻回顧

對於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研究的文獻，在國際學術上並沒有對此題目有綜合性的專著。而其他文獻可分爲對共產黨政治局與對越南政治的研究。

就對共產黨政治局之研究而言，Löwenhardt 等人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蘇聯政治局之興衰》曾對一九一九至一九九〇年蘇聯政治局有所研究，該政治局始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實爲其他各國共產黨政治局之始祖（Löwenhardt et al., 1992: 11-14）。[4] Löwenhardt 等人主要是將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九〇年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變化，以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布爾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柯及戈巴契夫等時代爲歷史脈絡，來加以分析。在第十章中作者分別以出生年（Birth）、死亡方式（Death，即自然、被殺與自殺）、政黨（Party，入黨日期與派系）、民族（nationality，如烏克蘭或喬治亞等）、出生地之面積（Size）、職業／教育（job/education）、職位（positions）等作爲分析的焦點（Löwenhardt et al., 1992: 169-228）。

Walter Durant與 E. A. Rees 分別在一九七九年與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專著中，則以史達林與其政治局的同僚如何控制蘇聯，作爲分析。其中主要探討史達林如何從集體領導而至獨裁，該政治局如何影響這段期間對蘇聯之經濟與外交政策（Durant, 1979；Rees, 2004）。

Harry Gelman 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專著中，則以布爾茲涅夫時代的政治局如何面對「低盪」（Détente）的研究（Gelman, 1984）。

前述這些專著當中，除了 Löwenhardt 者之外，其他三本都屬於某一時

[4] 當時蘇俄政治局的委員爲：L. B. Kamenev, N.N. Krestinskii, Lenin（列寧）、Stalin（史達林）及 Trotski（托洛斯基）；候補委員爲：N.I. Bukharin（布哈林）、M.I. Kalinin 及 Zinovev。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蘇聯政治局如何影響經濟與外交決策。在時間上並不是對蘇聯共產黨政治局作跨時期的研究，而其主要目的在於政策的形成。至於有關中共政局的專著，則除了一些文件彙編外，目前並無相關的研究。

就越南政治而言，曾先後出任越南共產黨機關報總編輯、於一九四五年出任越南臨時政府宣傳暨鼓動部長（*Bộ trưởng Bộ Tuyên truyền và Cổ động*）的陳輝燎（Trần Huy Liệu）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以親身經歷在研究越南人抗法運動時，也以大部份的章節研究越南共產黨的創立與組成，是研究該黨歷史的重要史料（陳輝燎，1973；1974a；1974b）。[5]

越籍學者黃金慶（Huyen Kim Khanh）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越南共產主義，1925-1945》（*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1945*）中，用了不少法文與越南文資料，研究上述年度中越南共產份子的發展與各派別間的分合，尤其是面對法國殖民政府、日本政府以及我國國民政府張發奎部隊時所作之決定（Huỳen Kim Khánh, 1982）。

與黃金慶同爲越籍學者的阮文景（Nguyen Van Canh）則於一九八三年出版的《1975～1982 年在共產主義下的越南》（*Vietnam under Communism, 1975-1982*）中，也是利用不少越南文資料對越南統一後至一九八二年該國的經濟、領導、黨與人民、壓迫與反抗、社會主義內容、宗教、再教育營以及對外關係等面向來檢視這段時期的越南（Nguyen Van Canh, 1983）。

另一位越籍學者蔡光中（Thai Quang Trung）則以一九四五年後胡志明統治越南至其逝世後的政治情勢加以研究。他認爲越南共產黨一直在宣傳上以爲依歸的胡志明傳奇其實早已打破，只不過是後來胡志明引用黎筍來平衡長征，至其在一九六九年去世爲止；之後越南便進入仍以「尊胡」爲號召，但以「集體領導」爲實際的權力運作方式（Thai Quang Trung, 1985）。

---

[5] 陳輝燎在該書序言中稱中文版出版年爲 1957 年，但該書出版資料顯示是在 1973 及 1974 年。陳輝燎（1901-1969）1938 年加入越南共產黨，同年任該黨機關報《消息報》總編輯，翌年被捕，1945 年越獄後又出任《救國報》總編輯，同年 3 月在宣光舉行的大會上當選爲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副主席，後歷任宣傳部長、文化救國委員會主席、越盟總部書記、國會統一委員會主任等職，之後便長期主導越南社會科學部門。參閱石井米雄等（1999：209）；姚楠（1995：245-24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Douglas Pike 所著的《越南人民軍》則分別從歷史傳統；組織與行政；政黨、意識形態與領導；戰略；人民軍與社會未來等面向來探討越南軍隊，其中與政黨及領導有關的第三章的內容較與越南政治局相關（Pike, 1986）。

William J. Duiker 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越南共產份子掌權之路》（*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中，主要是以歷史研究法，來研究越南共產份子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七五年從萌芽至一九七五年統一時的越南共黨份子的政治外交等（Duiker, 1996）。

Lewis M. Stern 之《革新越南共產黨》中討論越南共產黨六大至七大間的政治，尤其重視阮文靈如何帶領該黨走向「革新」政策，以及該政策在政治局中的反覆（Stern, 1993）。

二、分析架構

正如前述，不論對蘇聯政治局以及越南政治兩個角度來研究，主要是歷史研究法的方式，將蘇聯或越南共產黨在某個時期的意識形態、政治、外交與經濟政策爲主要研究的對象，對政治局之研究只不過是這些政策研究的附屬而已。

由於屬某個時期政策的歷史研究，因此這些研究鮮少有將不同時期的政治局加以比較，也較少作長時期的整體觀察。本研究是旨在透過長時間的觀察與比較，來歸納越南政治局的特色。

前輩的研究以 Löwenhardt 等人在一九九二年的研究最有啓示作用。他曾將蘇聯政治局委員以出生年、死亡方式、政黨、民族、出生地之面積、職業／教育、職位等作爲分析的指標（Löwenhardt et al., 1992: 169-228），實爲本研究分析架構的濫觴。

然而因爲畢竟越南的情況與蘇聯不同，Löwenhardt 等人的分析指標也非本研究完全可以套用，必須有所修改，始能有所成效。

首先出生年可以獲知政治局委員的世代，也可研究該政治局的年輕化與否，但目前因對個別越南政治局委員出生年的不詳，是故很難作出整體的比較，相信這是筆者未來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6]

[6] 筆者已經蒐集大部份越南政治局委員的出生年，但因缺乏黎文良、陳國環、童士元、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次者就死亡方式而言，直至目前爲止越南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的死亡方式以自然死亡爲主，非自然死亡則都是在三次越南戰爭中陣亡，與蘇聯政治局委員因政治因素的被殺、自殺或其他非自然死亡者不同。[7]

復次就加入政黨的時間而言，越南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只有在一九三〇年代創黨前後以及獨立後加入兩個時期較爲顯著，前者如武元甲、范文同等，而後者則如阮文靈等。然而由於東方人所重視的世代觀念，在六大以前掌政都是以創黨前後加入的第一代爲主，而六大以後則以獨立後三次越南戰爭時期加入者的第二代爲主。但是若以派系來研究越南共產黨，學者多以史達林派／托洛斯基派、親中派／親蘇派，以及北／中／南派作爲分析指標。[8]

其中除了史達林派／托洛斯基派的分類，只存於一九三〇年代，因爲自從謝秋輸（Ta Thu Thau）、黃文芳（Huynh Van Phuong）、阮文倫（Nguyen Van Luan）等人被罷黜後，該黨業已沒有托洛斯基派（Huỳen Kim Khánh, 1982: 190-205）。親中派/親蘇派之分類則在一九七九年黃文歡等人被罷黜後，亦鮮有親中派。

反而北／中／南派系的研究，較爲適合觀察整體越南的政治現象。越南本身的南北之分，許多學者都誤以爲是一九五六年日內瓦協議後的結果，但是越南分爲南北，甚至北中南的地域分佈，有其長久的歷史淵源。歷史上的越南可以分爲北方以京族爲主、中部以占婆族（Champa）爲主以及南方以吉蔑族（Khmer）爲主的三個國家。一六九七年京族滅了占婆；後又於一八一三年併吞了原由吉蔑族控制的南部。阮朝嘉隆帝時又將越南分爲北城（清化以北）、京城（清化至平順）以及嘉定城（平順以南）；後將之改爲北圻、中圻與南圻（Nguyễn Khắc Viện, 1999: 106-117；陳重金，1992：239-240、302、308-308）。在法國統治期間，則將之分別改稱爲東

春白、阮昇平與梅志壽六人的資料，是故不能作進一步之研究。

7 Löwenhardt 等人將 Bagirov、Bauman、Berilia（貝利亞）、Bukharin（布哈林）、Chubar、Eikhe、Ezhov、Kamenev、Kirov、Kosior、Krestinskii、Postyshev、Rudzutak、Rykov、Sokolinikov、Stasova、Syrtsov、Trotskii（托洛斯基）、Uglanov、Voznesenskii 及 Zinovev 爲被殺；而 Kulakov、Pugo 及 Tomskii 三人爲自殺；其他屬自然死亡或不詳。

8 例如陳輝燎是以史達林派／托洛斯基派爲標準；Thai Quang Trung 與 Nguyen Van Canh 是以親中派／親蘇派爲標準；而 Stern 則以南／北派爲標準。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安南與交趾支那，東京有由越南人組織的行政委員會、安南則是順化皇朝，二者皆屬法國之「保護國」，而在南方的交趾支那始爲法國的殖民地（Nguyễn Khắc Viện, 1999: 155）。連越南反法先驅潘佩珠在其〈自判〉中，都將三圻人士分得非常清楚（潘佩珠，1925：273）。[9] 越南共產運動成立期間，也先後在南圻、中圻、北圻分別成立安南共產黨（*Đảng Cộng Sản An Nam*）、新越革命黨（*Tân Việt Cách Mạng Đảng*）與越南共產黨，一九三〇年才在胡志明的領導下合併成爲印度支那共產黨（陳輝燎，1974a：25-32）。一九五六年日內瓦協定也將越南分爲南北兩個部份，中部人士分別依其政治歸屬而分別往南北遷移。[10]

正因如此，原本 Löwenhardt 等人所稱之民族與出生地面積的分析指標，也可以北／中／南派者互爲配合。惟因越南雖有 54 個民族，但主要的京族占了人口之 87% 以上，與尚未解體的蘇聯擁有 15 個大小較爲接近的加盟共和國顯有不同（Bộ Ngoại Giao Việt Nam, 2005a）。因此在研究越南政治時，民族與出生地面積的討論，顯然效果不大。

再者，Löwenhardt 等人以職業／教育作爲分析指標。就長期而言有其意義，但是大多數越南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都是出身於革命期間，他們一生的主要職業便是該黨的幹部，縱使他們在參加革命前有過工作經驗，但爲期都十分短暫，如武元甲曾在參加革命前當過中學的歷史教師，但最多也只不過是五年的時間而已（塞西爾・柯瑞，1999：56-70）。

而就教育程度而言，除了第九屆委員外，越南共產黨政治局的其他委員，除了少數如武元甲有大學以上程度外，其他都因在中學時代便參加革命，因而都沒有繼續升學。另可以提出探討的教育面向，便是有否受法國教育。早期有不少越南人都受法國教育，然而這些人大概都歸依南越政府，他們或是在統一前以「船民」身份逃出該國，赴法國、美國或其他西方國

9 潘佩珠稱：「（前者）三圻人士向來不相接觸，而氣質習尚各不相同。南圻人近於樸誠，而操急欲速，且物質之傾向太深。中圻人近於忠勇，且喜冒險而粗莽之情態難於融合感情。至於北圻人則文過飾非，而誠樸不足。雖其中皆有優秀分子，而混合眾流聚於一壑，實爲至難。」

10 例如有越南天主教發祥地之稱的發艷（Phát Diêm），在日內瓦協定後，該地人民便向南方大遷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或是在統一後爲共黨份子所迫害，是故以教育背景來研究該政治局的委員，至少至今仍未成熟。

最後吾人將 Löwenhardt 等人的分析指標加以修改，提出以職位、出身背景以及地理分佈仍爲本研究的分析指標，並以之構成分析架構。

就職位而言，吾人要從該政治局歷來的委員中，觀察那些職位是當然委員？那些職位因爲政治現象的變遷而有所改變？這與 Löwenhardt 等人者並無不同。

就出身背景而言，越南政治人物由其出身背景所衍生的經驗，與 Löwenhardt 等人的職業／教育可以相提並論，甚至在研究越南政治現象時更具說服性。

就地理分佈而言，影響越南政治人物決策與派系組成的不是出生地，而是其革命活動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爲越南一直都處於戰亂當中，由於顛沛流離的生活，出生地與其成長地常常不同，所以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反而是自其中學以來的革命活動地，所以北／中／南的分佈方式也可與之配合。

貳、政治局在越南決策中的地位

越南是一個蘇維埃式「以黨領政」的國家，而越南共產黨也是一個列寧式政黨，因此政治局在越南政經決策上，有其重要地位。然而吾人要研究政治局的地位，必須先討論越南共產黨在憲法中的地位，然後再討論政治局在越南共產黨的決策地位，始能更爲深入。

一、共產黨在越南憲法中的地位

越南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河內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一九七六年統一全國後，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直至二〇〇四年共有四部憲法。除一九四六年的憲法外，其他一九五九年、一九八〇年以及一九九二年三部憲法都將越南共產黨置於一個重要地位。

一九五九年的憲法序文中有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在越南勞動黨、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和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我國人民在民族統一戰線中廣泛團結，一定能夠在北方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中取得光輝勝利。我國人民一定能夠成功建設一個和平、統一、獨立、民主和富強的越南，爲保衛東南亞與世界和平事業作出貢獻。

越南一九八〇年憲法是仿傚蘇聯一九七八年憲法，更將越南共產黨的地位放在憲法條文當中，其第四條云：

> 作爲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越南工人階級先鋒隊與戰鬥參謀部，越南共產黨是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唯一力量，是決定越南一切革命勝利的主要因素。
>
> 黨爲工人階級及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鬥爭。
>
> 黨的各級組織在憲法範圍內活動。

因此吾人可以清楚的瞭解越南一九八〇年憲法中明文規定越南共產黨是領導越南國家與社會的「唯一力量」。

制定一九九二年憲法前，對於越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否要入憲，曾予以討論（Joiner, 1990: 1053-1065）。但最後仍以第四條將之入憲，其第四條云：

> 越南共產黨——越南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忠誠地代表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是國家與社會的領導力量。
>
> 黨的所有組織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換言之，一九九二年憲法仍維持越南共產黨的特殊地位，但文字將之由**「唯一力量」**，改爲**「領導力量」**。不過吾人從上述條文中可以瞭解越南共產黨在該國的領導地位。

從越南共產黨的角度而言，其一九九六年所通過的黨章序文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越南共產黨是執政黨。黨與人們緊密相連，尊重人民自主，受人民監督；依靠群眾從事黨建；團結並引領人民進行革命事業。黨領導政治體系，同時是其組成部分。黨領導、尊重並發揮政府、越南祖國戰線和其他社會政治團體的職能，以及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中活動。

黨結合工人階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積極爲世界人類的和平、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事業做貢獻。

越南共產黨要建設堅定政治、思想和組織，經常自我革新、自我整頓，不斷提高戰鬥力和革命領導能力。

而在該黨章的第十條第一款稱**「黨的組織體系與國家行政機關組織體系相對應」**。

該黨章在二〇〇一年曾經有所修訂，其序文稱：

越南共產黨是執政黨。黨與人們緊密相連，尊重及發揮人民自主權，受人民的監督；依靠人民來建設黨；團結並領導人民進行革命事業。黨領導政治體系，同時是其體系的一部分。黨領導、尊重並發揮政府、越南祖國戰線及其他社會政治團體的職能，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中活動。

黨結合工人階級的眞正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積極爲世界人類的和平、民族獨立、民主及社會進步事業做貢獻。

越南共產黨建設堅定的政治、思想和組織，經常自我革新、自我整頓，不斷提高幹部隊伍、黨員、戰鬥力及革命領導能力。

因此二〇〇一年的黨章雖有些許修訂，但越南共產黨作爲領導越南政治體系，同時又是其體系的組成部份，卻是十分清楚的。

而第十條第一款在二〇〇一年修改黨章時根本沒有任何變動，也顯示越南共產黨在政府各級部門中都有相對應的黨部組織，以收「領導」之效。

而長期擔任越南共產黨總書記的黎筍在一九七三年曾謂**「從領導而言，黨方通過國家、藉著國家來實行領導」**（Le Duan, 1994: 4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政治局在越南共產黨決策的地位

越南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不論是一九九六年或二〇〇一年的越南共產黨黨章，其第九條第二款都同樣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而兩次黨章也將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載於第十五條第二款：「評定前一會期決議執行結果，決定下一會期黨的路線、政策，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11] **必要時得補充、修訂黨的政治綱領和黨章**。」表面而言全國代表大會是越南共產黨最高的決策機關。

然而，若吾人從黨代表大會出席的人數來觀察，全國代表大會的人數在四大以後都是1,000人以上，如在一九三五年一大時出席人數只有13人，一九五一年二大為 158 人，一九六〇年三大時為 525 人，一九七六年四大時為 1,008 人，一九八二年五大時為 1,033 人，一九八六年六大時為 1,129 人、一九九一年七大時 1,176 名，而在一九九六年之八大，以及二〇〇一年的九大，則出席人數分別為 1,200 名與 1,168 名，其組成大多以越南中央各黨部、國家各部會以及地方各省之代表為主（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2001: vii；白石昌也，2000：23-25）。在這樣人數眾多的會議上，實難於作成決策。

再者從會期而言，越南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會期的時間，並沒有明文規定，但按其兩次黨章的第十五條第一款所規定：「**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的全國代表大會按慣例五年一屆，有可能提早或延後召開，但不可超過一年。**」。五年一次、每次約一星期左右，會期太短，亦難於作成決策。

根據第九條第二款的規定，由於黨代表大會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而黨大會休會會期，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黨的領導機關。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載於兩次黨章的第十六條第一款：「組織指導實現政治綱領、黨章、大會決議；決定內政、外交、群眾工作和黨建設工作的基本方針、政策；並準備全國黨代表大會下一會期，以及全國黨代表

[11] 許多文獻將之翻為「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但越南文原文應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故本文以後者為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臨時大會。」也就是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了越南所有對內對外政策的原則，並透過特別委員會以監督這些政策的實施。

表 1　越南共產黨各主要組織人數統計表

時　　間	時點	黨 員 數	黨代表人數		中執委委員數		政治局委員數		秘書處
			正式	候補	正式	候補	正式	候補	秘書數
1930.02.03	成立大會	565							0
1935.02.27~31	一大		13	3					
1951.02.11~19	二大	766,349	158	53	19	10	7	1	0
1960.09.05~12	三大		525	51	47	31	11	2	7
1976.12.14~20	四大	1,553,500	1,008		102	32	14	3	9
1982.03.27~31	五大	1,727,784	1,033		116	36	13	2	10
1986.12.15~18	六大	1,800,000	1,129		124	49	13	1	13
1991.06.24~27	七大	2,155,022	1,176		146		13		9
1996.06.27~07.02	八大	2,128,740	1,200		170		19		*
2001.04.19~0.202	九大	2,479,717	1,168		150		15		9

*本屆設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替秘書處，成員 5 人。

資料來源：“Hội Nghị Thành Lập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và Các Hội Nghị Trung Ương Trước Đại Hội 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ong Đuong”,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ong Đuong”,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II Của Đảng Cộ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V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Các Hội Nghị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Khóa IV”,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 Của Đảng Cộ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II Của Đảng Cộ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in Nguyễn Trọng Phúc (2003:45, 105, 295, 306, 439, 449-450, 692, 725-726, 745, 870-871, 983, 1049-1050, 1186-1189)；越南共產黨（1996：169）；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2001: vii)。

從人數而言，中央執行委員會雖較全國代表大會爲少，但人數其實亦很多。除了一九五一年二大時共有委員 19 名、一九六〇年三大時有 47 名外，其他一九七六年四大時 102 名、一九八二年五大時有 116 名、一九八六年六大時爲 124 名、一九九一年七大時則有 146 名，一九九六年八大時則有 170 名，而二〇〇一年九大時則爲 150 名，四大以後人數都在百數以上。吾人可從表 2 大致瞭解四大至九大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結構。

雲漢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越南共產黨各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統計表

	第四屆 1976-1982		第五屆 1982-1986		第六屆 1986-1991		第七屆 1991-1995		第八屆 1996-2001		第九屆 2001-2005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數	133	100.0	152	100.0	173	100.0	146	100.0	170	100.0	150	100.0
候補委員	32	24.1	36	23.7	49	28.3	N.A.	N.A.	N.A.	N.A.	N.A.	N.A.
舊人	47	35.3	86	56.6	92	53.2	104	71.2	96	56.5	87	58.0
新人	86	64.7	66	43.4	81	46.8	43	28.8	74	43.5	63	42.0
工人成份	21	15.8	25	16.4	22	12.7	20	13.6	17	10.0	7	4.6
婦女	7	5.3	8	5.2	13	7.5	12	8.2	18	10.6	13	8.6
少數民族	7	5.3	11	7.2	16	9.2	13	8.9	16	9.4	16	10.6
大學以上程度	13	9.7	43	28.1	75	43.3	95	65.0	151	88.8	138	92.0
40 歲以下	2	1.5	2	1.3	1	0.5	N.A.	N.A.	N.A.	N.A.	N.A.	N.A.
41~50 歲	13	9.7	16	10.5	36	20.8	21	14.4	39	22.9	25	16.6
51~60 歲	51	60.9	74	48.7	80	46.2	60	41.1	102	60.0	108	72.0
60 以上	37	27.8	60	39.4	56	32.3	60	37.2	29	17.0	17	11.3
黨中央幹部	22	16.5	30	19.7	25	14.4	26	17.8	27	15.8	N.A.	N.A.
中央政府幹部	43	36.3	53	34.8	60	34.7	48	32.8	50	29.4	N.A.	N.A.
軍人	22	16.5	18	11.8	19	11.0	14	9.5	21	12.3	N.A.	N.A.
省級人員	37	27.8	40	26.3	46	26.6	47	32.2	62	36.5	N.A.	N.A.
縣級人員	1	0.7	6	4.0	15	8.6	4	2.7	10	5.9	N.A.	N.A.

資料來源：Biểu số 4, Nguyen Huu Tri & Nguyen Thi Phuong Hong (2004)。

從會期而言，中央執行委員會按黨章第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大約每半年召開一次。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至三十一日一大以後，直至一九四一年五月十至十九日共召開 8 次中全會；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至十九日二大以後，直至一九五九年十月共召開 17 次中全會；一九六〇年九月五至十二日三大後，直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共召開 25 次；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至二十日四大後，直至一九八二年共召開 12 次；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七至三十一日五大以後，直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共召開 11 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至十八日六大以後，直至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爲止共舉行 5 次。一九九一年召開七大以後，直至一九九五年元月，共召開 8 次（Nguyễn Trọng Phúc, 2003: 1555-1566；Pham Hong Linh, 1984；Vasavakul, 1997: 33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人數與會期而言，中央執行委員會亦與全國代表大會一樣，只能作原則上的決議，無法作實質的決策。

而且根據越南共產黨黨章序文所規定，其組織決策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因此政治局便成爲越南政經的實質決策機關。

參、政治局委員的產生與職權

政治局是越南共產黨的決策核心。正如上述，政治局委員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其中必包括總書記。根據一九九六年黨章第十七條稱：

> 中央執行委員會選組政治局；在政治局委員中選任總書記；在中央檢察委員會委員中選任中檢委主任。
>
> 政治局和中檢委委員數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
>
> 政治局推舉政治局常務委員。

政治局內亦有所謂的「五人小組」，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在一九九六年黨章中將之正式稱爲「政治局常務委員」。

> 政治局常務委員代表政治局領導和督察黨決議的實現；準備各問題讓政治局審查、決議；指導實現有關社會經濟、國防安全、外交、黨建、幹部組織、群眾工作的主張；解決黨的例行事務。

二〇〇一年黨章該條有所修正，規定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本身選出書記處書記，取消了「政治局常務委員」，其職權由書記處負責；並規定總書記不得連任兩屆。

然而一九九一年七大時的總書記杜梅是由政治局委員於當年六月二十四日互選出來而非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不過該安排在二十七日由全國代表大會審查黨章修正案時，黨代表大多傾向黨總書記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Stern, 1993: 147 Table 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越南共產黨政治局歷屆委員名單

時間	時點	正　　式　　委　　員	候 補 委 員
1951	二大	胡志明（1）、長征（2）、黎筍（4）、黃國越（9）、武元甲（5）、范文同（6）、阮志清（3）。	黎文良(12)。
1960	三大	胡志明（1）、黎筍（9）、長征（8）、范文同（12）、范雄（19）、武元甲（15）、黎德壽（41）、阮志清（36）、阮維楨（44）、黎清毅（31）、黃文歡（17）。	文進勇(10)、陳國環(18)。
1976	四大	黎筍（1）、長征（2）、范文同（3）、范雄（4）、黎德壽（5）、武元甲（6）、阮維楨（7）、黎清毅（8）、陳國環（9）、文進勇（10）、黎文良（11）、阮文靈（20）、武志功（31）、朱輝敏（43）。	素友（12）、武文杰(30)、杜梅（32）。
1982	五大	黎筍（1）、長征（2）、范文同（3）、范雄（4）、黎德壽（5）、文進勇（10）、武志功（14）、朱輝敏（13）、素友（15）、武文杰（16）、杜梅（17）、黎德英（101）、阮德心（44）。	阮基石(45)、童士元(36)。
1986	六大	阮文靈（1）、范雄（2）、武志功（3）、杜梅（4）、武文杰（5）、黎德英（6）、阮德心（7）、阮基石（8）、童士元（9）、陳春白（10）、阮昇平（11）、段奎（12）、梅志壽（13）。	陶維松(14)。
1991	七大	杜梅（1）、黎德英（2）、武文杰（3）、陶維松（4）、段奎（5）、武鶯（6）、黎福壽（7）、潘文凱（8）、裴善吾（9）、農德孟（10）、范世閱（11）、阮德平（12）、武珍志（13）。	
1996	八大	杜梅、黎德英、武文杰、農德孟、黎可鏢、段奎、潘文凱、阮孟琴、阮德平、阮文安、范文茶、陳德良、阮氏春美、張晉創、黎春松、黎明鄉、阮廷肆*、范世閱、阮晉勇。	
2001	九大	農德孟、陳德良、潘文凱、阮明哲、阮晉勇、黎明鄉、阮富椿、潘演、黎鴻英、張晉創、范文茶、阮文安、張光德、陳定環、阮科恬。	

（ ）內之數字內表其在當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排名，而八大、九大所公佈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名單，是以越南習慣姓名字母順序排列，故無法知道其排名。

* 八大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開始，當天選出政治局委員，但阮廷肆於二十八日逝世，八大仍未開完。

Sources of Data: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ong Đuong”,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Đong Đuong”,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II Của Đảng Cộ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V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Các Hội Nghị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Khóa IV”,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 Của Đảng Cộ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I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II Của Đảng Cộng Lao Động Việt Nam”, in Nguyễn Trọng Phúc(2003: 105, 306, 439, 449-450, 692, 725-726, 745, 870-871, 983, 1049-1050, 1186-1189) ；越南共產黨（1996：169）;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2001: vii)。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政治局的職權則載於黨章第十七條第二條：「**政治局領導與監督全國代表大會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的實施；決定基本方針、政策、組織與幹部等問題；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會期的召開和議程；以及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或依其要求作工作報告。**」一九九六年與二〇〇一年兩次黨章並無相異之處。

政治局委員的人數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但其數額常不定，例如二大爲 7 人、三大爲 11 人、四大爲 14 人、五大爲 13 人、六大爲 13 人、七大爲 13 人、八大爲 19 人，而九大則爲 15 人。

至於候補委員，其名額也是並不一定，例如二大時爲 1 人、三大時爲 2 人、四大時爲 3 人、五大時爲 2 人，六大以後直至九大並沒有候補委員之設。

肆、政治局委員之職務分配

政治局委員當中，總書記、國家主席與總理這「三頭馬車」（*Troika*），常是政治局委員，甚至都是被稱爲「五人小組」的常務委員。總書記（*Tổng Bí Thư*）一職於三大時仿蘇聯方式稱之爲「第一書記」（*Bí Thư thứ nhất*），但到了六大以後則又稱回總書記。[12] 總書記出任政治局委員者如二大的長征（Trưỡng Chinh）、三大至五大的黎筍（Lê Duẩn）、六大的阮文靈（Nguyễn Văn Linh）、七大至八大的杜梅（Đo Mươi），以及九大的農德孟（Nông Đức Mạnh），其中也包括八大一中全會以後至九大間的黎可鏢（Lê Khả Phiêu），都是政治局委員，也是政治局常委。[13]

從越南共產黨黨章而言，總書記與政治局委員兩種職務，是先有後者才有前者，因爲政治局委員始可被選爲總書記，所以總書記必爲政治局委

[12] 若按越南文原文，該兩職應稱爲「總秘書」及「第一秘書」。本文所用之「總書記」及「第一書記」，乃按約定俗成者。

[13] 本文所有有關政治局委員當時的職稱，是以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inh Phủ (2000)、Nguyễn Trọng Phúc (2003) 爲主，並輔以 Duiker (1989)；Tucker (1998)；Pham (2001a, 2001b)；石井米雄等（1999）；姚楠（1995）。另國內對 Lê Khả Phiêu 之譯法，有黎可飄、李開卜等，本文按越南共產黨出版之中文版文件而譯爲黎可鏢（越南共產黨，1996：169）。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但是越南共產黨在二大至一九六九年時均有黨主席的設置，由胡志明擔任，但一九六九年胡志明逝世後，該位置一直懸空，直至一九八五年才正式取消該職務，其間之所以仍未遞補，原因是要維持集體領導的原則。在有黨主席設置期間，由於黨主席的地位較總書記崇高，再加上胡志明個人在越南共產黨的地位，他是政治局委員，也是政治局常委的安排，有其必要。有云二大時越南共產黨在黨主席之下，增設總書記，是因爲當時有黨員懷疑胡志明在革命期間出賣了越南反法民族主義先驅的潘佩珠（Phan Boi Chau）等人，而迫使他將權力下放（Thai Quang Trung, 1985: 16）。[14] 當有黨主席設置期間，總書記雖然並非是黨內第一號政治人物，但也常是政治局委員，以及政治局常委，二大之長征與三大之黎筍便是其代表人物。

越南政治上的「三頭馬車」爲政治局的當然委員，誠爲不爭的事實，但是總書記的先決條件便是政治局委員；而國家主席與總理分別是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也應該是政治局委員，但是歷史上並不完全如此。

國家主席（*Chủ tịch nước*）常是政治局委員，甚至是常委。越南一九八〇年憲法仿傚蘇聯一九七七年憲法，不設國家主席而設國務委員會，其主席的職權便有如國家主席，其餘在實行其他三部憲法時則稱爲國家主席。[15] 由越南國家主席出任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者如二大至三大之胡志明、四大至五大的長征（Trưỡng Chinh）、六大的武志功（Võ Chí Công）、七大的黎德英（Lê Đức Anh），以及八大至九大的陳德良（Trẫn Đức Lương），都是政治局委員，甚至是政治局常委。

越南國家主席亦未有成爲政治局委員，例如孫德勝（Tôn Đức Thắng）與阮友壽（Nguyễn Hữu Thọ）兩位國家主席並未有成爲政治局委員。孫德勝是越南共產黨黨員，長期出任國會主席兼其常務委員會主席，甚至於一

[14] 潘佩珠（1867-1940），字巢南，爲廿世紀初越南反法民族主義領袖，1903 年創立維新會（Duy Tan Hoi），1905 年赴日奔走革命，先後與梁啓超、孫中山等人交往。1908 年被迫離開日本，轉赴中國，1912 年依孫中山共和的主張，改其原組織爲越南光復會（Viet Nam Quang Phuc Hoi）。1925 年在上海爲法人所拘捕，押解至順化軟禁，直至 1940 年逝世。參閱：新民叢報社社員編（1908）；潘佩珠（1925）。

[15] 所以五大至七大時此職應稱爲國務委員會主席，而非國家主席，但爲行文方便，故而統稱爲國家主席。有關國家主席的職權可參閱 1946 年憲法第 49 條、1959 年憲法第 63～64 條、1980 年憲法第 100 條以及 1992 年憲法第 103 條。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六九年胡志明逝世後出任國家主席，但爲何沒有進入政治局，則不得而知。而阮友壽本身並非越南共產黨黨員（Duiker, 1989: 125；Pham, 2001a: 588-589）。

總理（*Thủ tướng*）一職在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九年與一九九二年憲法都是指行政體系的政府首長。[16] 但是在一九八〇年憲法，由於仿傚蘇聯一九七八年的體制，將之稱爲部長會議主席（*Chủ tịch Hội đồng Bộ trưởng*）。不過無論如何，總理一職常是政治局委員，亦常是政治局常委，如二大至五大的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六大的范雄（Phạm Hùng）、七大至八大的武文杰（Võ Văn Kiệt），以及九大的潘文凱（Phan Văn Khải），都是政治局委員，也是政治局常委。

國會主席（*Chủ tịch Quốc HộI*）有時也出任政治局委員如三大之長征、八大之農德孟以及九大的阮文安（Nguyễn Văn An）。初期國會主席除長征外很少出任政治局委員，但在七大以後國會有越來越活躍的跡象，已經不是昔日的「橡皮圖章」，造成後來國會主席出任政治局委員的趨勢，而這規律也似業成定例（Montesano, 2005: 409-410）。

在部會首長方面，阮文景認爲越南重要的部會爲內政部、國家計畫委員會、外交部、人民軍總政治部與後勤部與交通運輸部（Nguyen Van Canh, 1983: 70-71），但是阮文景的研究只針對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的越南政治加以研究，若將觀察期拉長，則筆者認爲越南外交、國防、公安與代表經濟體系的國家計畫委員會，是最重要的四個部會，因爲其部長也常是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Bộ trưởng Bộ Ngoại giao*）如二大之胡志明、三大之范文同、四大之阮維楨（Nguyễn Duy Trinh）、六大時之阮基石（Nguyễn Cỏ Thạch）、八大時之阮孟琴（Nguyễn Mạnh Cầm）等，都是以外交部長身份進入政治局。[17] 胡志明是以國家主席與黨主席身份兼任外交部長，而范文同則是以

[16] 該職之越南文原文爲 *Thủ tướng*，應翻譯成「首相」，但爲了遷就中文之用法，故翻爲「總理」。有關總理的職稱，可參閱 1946 年憲法第 44 條、1959 年憲法 72 條、1980 年憲法第 105 條以 1990 年憲法第 110 條。

[17] 胡志明自 1946-1955 年曾以政府主席身份兼任外長，而范文同則於 1955-1961 年則總理兼任外長，參閱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ính Phủ (2000: 341-411)；Trịnh Thú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理身份兼任，他們之出任政治局委員，並非因外交部長一職，而是由於其本身在黨國的地位。四大的阮維楨是因爲當時越南在統一後，需要依賴蘇聯的援助，而阮維楨本身先後出任過駐蘇大使與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對蘇聯援助的穩定性有其一定的作用。五大時外交部長阮基石雖未有出任政治局正式委員，但也有候補委員之資格，而與美談判代表的前黨中央對外委員會主任黎德壽（Lê Dức Thọ）也進入政治局。[18] 而七大時外交部長阮基石因要退休，而新任外長仍未發布，故仍未在政治局名單之內。一九九四年七大中全會中已新增外長阮孟琴爲委員。九大時外長阮怡年（Nguyễn Dy Niên）也不在名單內，是因爲其對外政策仍受爭議，反而曾任外交部次長、時任計畫投資部長的武寬（Vũ Khoan）出任書記處書記，不久武寬即被任命爲副總理，此與越南較爲重視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以及其他貿易談判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次者就國防部長（*Bộ trưởng Bộ Quốc phòng*）而言，越南自一九四五年獨立以來，直至一九七九年以後歷經三次越南戰爭，是故軍方勢力在越南政治中都一直扮演重要地位。以國防部長身份成爲政治局委員者如在二大至四大之武元甲（Võ Nguyễn Giáp）、五大之文進勇（Văn Tiến Dũng）、六大之黎德英（Lê Đức Anh）、七大與八大段奎（Đòan Khuê）以及九大之爲范文茶（Phạm Văn Trà）等。

復次就公安部長（*Bộ trưởng Bộ Công an*）或內政部長（*Bộ trưởng Bộ Nội vụ*）方面，如三大至四大的陳國環（Trần Quốc Hoàn）、五大之范雄、六大的梅志壽（Mai Chí Thọ）、七大的裴善吾（Bùi Thiện Ngộ）、八大至九大的黎明鄉（Lê Minh Hương）等人，都是以公安部長或內政部長身份入政治局。而二大時並未有公安部長，而內政部長黃則剛（Huỳnh Thúc Kháng）也於一九四七年便逝世，一直由潘繼遂（Phan Kế ToạI）代理，故未入政治

Huỳnh et al. (2004: 113)。

[18] 黎德壽在 1952-1954 年任第九軍區政委，後任黨高級幹部學校校長、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並於 1955-1957 年出任黨中央對外委員會主任；1960 年三大時出任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直至 1982 年五大爲止（Nguyễn Khải, 1996: 51；Trịnh Thúc Huỳnh et al., 2004: 110；Thai Quang Trung, 1985: 102；McWilliams, 1983: 64；Pike, 1985: 2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局。[19]

再次就經濟方面而言，越南自一九四六年獨立以來有關經濟部門多如牛毛如農業部（*Bộ Nông nghiệp*）、重工業部（*Bộ Công nghiệp nặng*）、輕工業部（*Bộ Công nghiệp nhẹ*）、對內商業部（*Bộ Nội thương*，內商部）、對外商業部（*Bộ Ngoại thương*，外商部）、財政部（*Bộ Tài chính*）等，而它們也常有分合，所以不容易出現代表經濟方面的單一委員，但是其中作爲統整的國家計畫委員會（*Uỷ ban Kế hoạch Nhà nước*）較爲穩定，所以三大之阮維楨、四大的黎清毅（Lê Thanh Nghị）與范雄、五大至六大的武文杰、七大的潘文凱等都是經濟方面的代表。不過三大時的黎清毅與范雄也分別爲主管工業與農業的副總理，但四大以後的黎清毅、武文杰與潘文凱則以國家計畫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廁身政治局。[20]

正如前述，越南是「以黨領政」的國家，因此黨務系統在各層級當中也有其代表。吾人從表 2 得知，中央黨務系統的幹部從四大至八大之間，占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4.4～19.7%，勢力相當龐大。[21] 黨務系統方面，昔日黨內主管意識形態者絕對是政治局委員，其中如二大至五大之長征，四大至五大的素友（Tớ Hữu），六大時的陳春白（Trẫn Xuân Bách），七大的陶維松（Đào Duy Tùng），八大之黎春松（Lê Xuân Tùng）、九大之阮富椿

---

19 1945 年越南只有內政部，沒有公安部。1955-1975 年則內政部與公安部並存，但在 1975 年後二者合併爲公安部，參閱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ính Phủ (2000: 341-411)。

20 1995 年國家計畫委員會改爲計畫投資部(*Bộ Kế hoạch và đầu tư*)。參閱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ính Phủ (2000: 405)。

21 這些中央黨務系統包括了：中央辦公室（Văn phòng Trung ương）、中央組織委員會（Ban Tổ chức Trung ương)、中央檢察委員會（Ủy ban Kiểm tra Trung ương）、中央思想文化委員會（Ban Tư tưởng-Văn hoá Trung ương）、中央財政管治委員會（Ban Tài chính- Quản trị Trung ương）、中央內部政治保衛委員會（Ban Bảo vệ chính trị nội bộ Trung ương）、中央內政委員會（Ban Nội chính Trung ương）、中央科教委員會（Ban Khoa giáo Trung ương）、中央對外委員會（Ban Đội ngoại Trung ương）、中央民運委員會（Ban Dân vận Trung ương，掌大眾工作與宣傳）、中央經濟委員會（Ban Kinh tế Trung ương）、海外黨幹事委員會（Ban Cán sự đảng ngoài nước）以及人民報社（Báo Nhân dân）、共產雜誌社（Tạp chí Cộng sản）、國家政治出版社（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與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Học việ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等，參閱 Nguyễn Hữu Trí & Nguyễn Thị Phương Hồng (2004: 107-108)；白石昌也（2000：2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Nguyễn Phú Trọng）等都是主管意識形態。素友一直都是長征的追隨者，他因長征而上台，也因長征而下野（Pike, 1982: 237-238；Duiker, 1989: 169-170）。陳春白在一九九〇年時因思想過於激進而被逐出政治局（Womack, 1997: 83-84）。而陶維松原本在八大之前因獨攬「大會政治綱領草案」而勢力大增，但後來因草案提前曝光引起黨內大肆評擊，也就黯然下台（梁錦文，1998：26）。黎春松爲黎可錂之左右手，但在九大時亦隨黎氏而下台。阮富椿爲越南少數之政治學博士，曾任河內黨委書記、中央思想文化委員會主任等職務，成爲新一代掌控越南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Nguyễn Phú Trong, 2004）。

九大時文化部長阮科恬（Nguyễn Khoa Điềm）卻成了首位進入政治局的文化部長。其實此乃有跡可循，從七大時國家政治學院院長阮德平（Nguyễn Đức Bình）進入政治局，而八大時阮德平不但仍留任，還加上了黨中央科學暨教育部長阮廷肆，可見在革新政策提倡後，爲了培訓人才，文化教育受到越南當局的重視。但是阮廷肆當選後便逝世。然而文化方面由黨官而至內閣官員，除顯示越南正在向黨國分離的路線移動，更表現其對真正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視。

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與中央民運委員會兩位主任在一九七六年後也是政治局的常客。中央組織委員會者如三大至四大時的黎德壽、五大的阮德心（Nguyễn Đức Tâm）、六大的武志功、七大的黎福壽（Lê Phước Thọ）、八大至九大的阮文安等，都是中央組織委員會的主任。阮德心、武志功與黎福壽長期都在南部活動，武志功則曾任「越共」之副主席、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年六月任副總理並於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二月兼任海產部長，繼而在七月兼任農業部長（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inh Phủ, 2000: 375-384）；黎福壽曾於一九八六年出任黨中央農業委員會主任兼書記處書記（Pike, 1984: 282；Tucker, 1998: 227）。由此可見，五大至七大之間越南共產黨較重視在南方的組織工作。阮文安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爲電力工程師、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七年都在南寧省黨部任書記、一九八七年任組織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九六年成爲主任（Quốc hội Nước Cộng hoà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2005）。

而中央民運委員會主任則如五大的素友、六大的陳春白以及九大的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光德（Trương Quang Được）等。七大及八大時雖然該主任不在政治局內，但前主任武鶯（Vũ Oanh）以及阮德平兩位可以代表。

至於黨中央對外委員會，並未有現任主任出任政治局委員，只有兩位前任主任出任，即三大時的黎德壽與四大時的范雄而已。但是黎德壽之所以上榜，主要原因是他爲黎筍的重要盟友而已。而范雄則由於他一直是南方代表之故。另一位在越戰期間甚爲重要、掌握黨中央對外委員會主任凡十八年（1961～1979）的春水（Xuan Thuy），反而未出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之內，蓋因其親中派的政治立場之故（Trịnh Thúc Huỳnh et al., 2004: 110-113）。[22]

七大以後黨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也是常客如七大之武鶯、八大至九大之張晉創（Trương Tấn Sang）。連一九九四年七大中全會時該職的新任主任阮河藩（Nguyễn Hà Phan）也補選入政治局，他在一九九一年曾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一九九二年任國會副主席；一九九三年元月才出任經濟委員會主任。阮河藩一度被視爲武文杰之接班人，但在一九九六年四月發現他曾因於一九六〇年代向南越警察供出越共游擊隊名單而下台（Tucker, 1998: 297；梁錦文，1998：26）。

一九九四年七大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檢察委員會主任也常榜上有名，如七大中全會後之杜光承（Đỗ Quang Thắnh）、八大之阮氏春美（Nguyễn Thị Xuân Mỹ）以及九大之黎鴻英（Lê Hồng Anh）。[23] 蓋因「革新」以後越南也已出現不少包括貪污倒買等經濟犯罪行爲，強調紀律檢察之故。[24]

然而九大的陳定環（Trần Đình Hoàn）以黨中央辦公室主任的身份進入政治局，卻是首例。

越南不只向黨國分離，也向中央與地方分權而發展，因此地方首長進入政治局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在地方首長方面，一九七六年越南統一後，

---

[22] 春水於 1963-1965 年繼范文同出任外交部長；1971-1975 年出任不管部部長；在黨職方面則先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於 1961-1979 年出任中央對外委員會主任。參閱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ính Phủ (2000: 351, 361, 367)。

[23] 黎鴻英於八大時任建江省書記（Nguyễn Khải, 1996: 19）。

[24] 據聞如張晉創之所以由胡志明市黨委書記調任黨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是因爲其在該市貪污嚴重，故以調虎離山的就近監視；而前黨總書記杜梅及黎可鏢之下野，亦與其親屬或部下貪污有關。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河內與胡志明市的黨委書記亦常有入政治局之列，如河內市黨委書記如四大之黎文良（Lê Văn Lương）、七大之范世閱（Phạm Thế Duyệt）、八大之黎春松、九大之阮富椿；胡志明市黨委書記如四大之阮文靈、六大之梅志壽、七大之武珍志（Võ Trần Chị）、八大之張晉創與九大之阮明哲（Nguyễn Minh Triết）等，都是政治局委員。[25] 此外中部大城峴港（Đa Nang），其地方的主政者亦常爲政治局委員，如八大之段奎、八大至九大的潘演（Pham Diễn）則分別以峴港軍區政委、峴港黨委書記的身份進入政治局。而張光德於八大時任廣南-峴港省人民政府主席，並出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Nguyễn Khải, 1996: 19）。[26] 此也顯示了地方向中央爭權的結果。

此外黃國越在二大時是以越南總工會主席身份出任政治局委員，他於一九三〇年代與長征合辦《勞動報》（*Lao Động*），一九四〇年便已經成爲印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五年被派往南部活動，一九五〇年出任越南總工會主席（Duiker, 1989: 71；Pham, 2001b: 272）。

伍、政治局委員之出身背景

與政治局委員職務相關的便是其出身背景，正如前述，國防、公安、外交與經濟方面的代表常占重要地位，所以政治局委員，亦是以這些出身背景爲最多。就國防體系而言，由於越南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代都分別與法國、美國、中共與柬埔寨處於戰爭當中，是故軍方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比例甚高，例如四大時便有 22 名委員，占 16.5%，然而五大至七大期間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但在八大時又再回升；在政治局中也同樣反映出該趨勢。國防體系的政治局委員如二大與三大時的武元甲、阮志清；四大時的武元甲、文進勇與朱輝敏（Chu Huy Mân）；五大時的文進勇、朱輝敏與黎德英；六大與七大時的黎德英與段奎；八大時的黎德英、黎可鏢、段奎、阮晉勇（Nguyễn Tấn Dũng）與黎明鄉（Lê Minh Hương）；九大時的黎明鄉與范文茶等。這些人士都是與越南對外戰爭有關

[25] 武珍志在越戰期間爲西貢游擊隊領袖，1977 年被選爲越南共產黨胡志明市第五郡（提岸）之書記，1986 年任該市黨委書記，直至 1996 年自該職退休（Tucker, 1998: 476）。

[26] 潘演於八大時曾任黨中央辦公室主任（Nguyễn Khải, 1996: 19）。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的重要人物，二大至四大出任國務部長之武元甲，爲越南人民軍之建軍者，又是奠邊府一役的指揮，並在越南軍隊上的地位無人能出其右。阮志清於一九五〇年出任越南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出任總司令，在與美戰爭中主持不少軍事行動；朱輝敏亦曾任越南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Tucker, 1998: 104, 224, 226, 295-296, 439, 475-476；Pike, 1986: 331-351）。五大時的文進勇於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二年任總司令，領導北方軍隊戰敗美軍與南越，統一全國後，更先後主持進軍柬埔寨及與中共的戰爭（Tucker, 1998: 439）。六大時的黎德英曾於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兩度出任第九軍區司令、一九七八至八一年任第七軍區政委，是入柬越軍的總司令（Nguyễn Khải, 1996: 51, 73）。段奎曾任第五軍區（峴港）政委，尤其對美戰爭中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國防體系的變化中，吾人可以觀察出在三大以前是以抗法將領如武元甲爲主，而三大至五大則改爲以抗美將領如阮志清、文進勇與朱輝敏爲代表；五大以後則以入柬將領如黎德英、段奎及黎可鏢爲代表。

與國防系統息息相關的是公安系統，二者常有人員對流的情況，因爲許多軍方人士，都曾是軍中政委，也就是負責公安系統，只是軍人文人間的對流，而非性質上的不同，這些政治局委員在二大至六大時包括武元甲、阮志清、朱輝敏等人，再加上一九九四年七大中全會補選後之黎可鏢、以及八大至九大的阮晉勇、黎明鄉等人。不過越南掌握公安系統最長的人物便是陳國環，他自一九五三年六月一直掌管公安部，至一九八〇年二月由范雄接任（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inh Phủ, 2000: 349-376）。[27] 陳國環之所以下台，蓋因當時黎筍認爲陳國環未能有效對付親中派人物，而黎筍又爲了鞏固其地位，任用其子黎洪（Lê Hong）來掌控公安部門（Nguyen Van Canh, 1983: 71）。陳國環因而被架空，但黎洪本身又不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故而不能出任政治局委員。一九八七年梅志壽之所以出任公安部長，原因有二：首先他是黎德壽之弟，越南共產黨其他人

[27] 陳國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排名，分別是三大時的第 18 名、四大時的第 9 名、五大時的第 9 名、六大時則完全退出。五大時其排名爲第 9 名，卻沒有在政治局取得席位，可見其權力下降（Nguyễn Trọng Phúc, 2003: 449-450, 870-871, 1049；Thai Quang Trung, 1985: 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士希望以他的上台，以換取黎德壽之下台；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胡志明市期間，與阮文靈互爲配合得相當良好，是故阮文靈出任總書記後，必須倚重梅志壽爲其股肱（Richburg, 1987: 12；Esterline, 1988: 89）。

至於軍人轉任公安系統者，武元甲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身的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屬下的麋鹿小組（the “Deer Team”）有關係，而他在一九四五至六年臨時政府時也曾出任內政部長，奠下越南內政公安系統（Marr, 1995: 271-291；Tucker, 1998: 309-310；塞西爾・柯瑞，1999：119-141）。阮志清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曾任多處地方的黨部書記，主要在爲越南共產黨建立後來稱爲「胡志明共產主義青年團」（*Thanh Nien Cong San Chu Nghia Ho Chi Minh*）的組織工作；一九五〇年代後便加入軍方，出任許多軍區的政委，其後更出任總政治部主任（Pike, 1986: 340；Tucker, 1998: 295-296；Duiker, 1989: 121；Pham, 2001a: 546-547）。朱輝敏曾在越北高平（Cao Bang）地區協助武元甲建立第一個軍中宣傳小組，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年他出任幾個軍區的司令員兼政委，其後他更取代雙和將軍（General Song Hao）出任越南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Pike, 1986: 338-339）。黎可鏢則於一九六四至一九九三年同樣也是先後出任幾個軍區的政委，然後出掌總政治部。阮晉勇曾任南部建江（Kien Giang）省黨部書記、第九軍區黨委會委員，並於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出任內政部次長及黨中央公安委員會委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RV, 2002）。黎明鄉在九大時則是公安部長（Vietnam Economic Times, 2001）。

外交體系亦是政治局的常客。如二大時的總理兼外交部長范文同與駐蘇大使黎文良（Lê Văn Lương）；三大時的阮維楨與駐中共大使黃文歡（Hoàng Văn Hoàn）；四大時的黎德壽、阮維楨與黎文良、五大與六大時的阮基石，以及八大時的阮孟琴。在外交體系的變化當中，三大以前是以中共與蘇聯爲主要外交對象，因而政治局必須要有與這兩國關係良好的人士，如二大時的黎文良與三大時的黃文歡便是。一九七六年四大以後由於親中派被罷黜，包括黃文歡、李班（Ly Bang）以及其他三位前駐中共大使：阮仲榮（Nguyễn Trọng Vinh）、吳明聯（Ngô Minh Loan）與吳銓（Ngô Thuyễn），分別先後逃亡至中國大陸或被軟禁，故外交體系轉而以與美談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判功臣及與蘇緊密關係者爲進入政治局之考量。四大時的黎文良又以前駐蘇大使及當時的河內黨委書記的身份再次出任政治局委員。而阮維楨則先後任國家計委主任與外交部長，與蘇聯的關係密切，再加上當時越南正亟需蘇聯之經濟援助，是故他的成爲政治局委員便可以理解。六大以後則開始重視對全球開放的政策，故也以有全球視野的外交人士如阮基石、阮孟琴等人出任政治局委員。阮基石曾在巴黎談判時協助黎德壽，也是越南首位提出向全球開放的外交部長。而阮孟琴在出任外交部長前曾任駐蘇大使，顯示當時越南外交政策仍在共產陣營與向全球開放間擺蕩。

經濟體系的代表人物如二大至三大時的長征；三大時有經濟沙皇之稱的黎清毅；四大時的黎清毅與武志功；五大與六大時的武志功、有建設沙皇之稱的童士元（Đồng Sỹ Nguyễn）、武文杰與杜梅；七大之杜梅與武文杰；八大時的杜梅、武文杰與潘文凱；九大時的潘文凱、張晉創等。然而在這些經濟體系代表當中，也由於年代與政策的不同，亦有所改變。二大至三大時的長征，便是主張越南應跟隨中共土地改革，是當時領導越南走向中共式經濟發展的主要人物，但在一九六〇年代因這種土改失敗，長征權力下降，黎清毅在黎筍的支持下，成爲政治局委員，爲蘇聯史達林發展模式鋪路。[28] 黎清毅在成爲政治局委員後，積極與蘇聯拉攏，以蘇聯史達林模式爲依歸，完全沒有顧及越南本身的經濟秉賦，提出「重工輕農，重重輕輕」的發展策略，也就是「重視工業、輕視農業；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由黎清毅主導的這種史達林模式，使得越南從一九六〇代至一九八九代前期的經濟都十分困難，尤其是一九七六年越南統一後的經濟大蕭條，更使越南共產黨不能以戰爭爲理由，而不得不面對經濟發展的問題。因此五大時越南共產黨業已對史達林模式多所爭議，因而有些許改變。不過由於黎筍仍極力支持黎清毅，是故變化不大。及至一九八六年越南在阮文靈領導下，一反史達林發展模式，而進行革新，提出「重農輕工，重輕輕重」的發展策略，並主張越南經濟將調整爲「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爲發展原則，因而主張市場經濟的梅志壽、武文杰、潘文凱、張晉創等人紛

[28] 有關長征主張的土改政策與其失敗，請參閱 Troung Chinh (1994: 439-528)；白石昌也（1994：73-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紛進入政治局。

國防、公安、外交與經濟四大體系也因爲越南政經情勢發展而有所變化。在三次越南戰爭時期，國防體系的政治局委員人數較多，但是一九八二年五大以後其軍方人數較少，也就是當戰爭期間，軍方發言權大增，是故在政治局也增加了國防體系的員額。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六大以後國防體系的政治局委員較少，但是公安系統的員額仍然很多，可見在革新時期的過程中，越南共產黨內部仍有不少對革新的程度及取向的不同意見，甚至是力保較爲保守的派系運作，以便對革新者予以制衡。

陸、政治局委員之地域分佈

越南政治局委員出身的地域也是值得探討，研究越南政治的學者都認爲所謂地域分佈並不是以其出生地爲標準，而是以其活動地爲標準。而對越南政治地域上的分佈最初是以南北兩派來分，所謂北派是在北越執政的人士，而南派則是在前二次越戰期間潛入南方進行革命的人士。

二大時北派人士占 75%，而南派則占 25%，當時分別排名第三與第四的黎筍與黃國越是南派人士，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如胡志明、長征、武元甲、范文同、阮志清都是北派人士，連候補委員的黎文良也是駐蘇大使，北派顯然占了多數。此因時在日內瓦協議、南北仍未分治以前。南方雖有共產革命活動，但與北方的共產勢力基本上仍然沒有建立很強大的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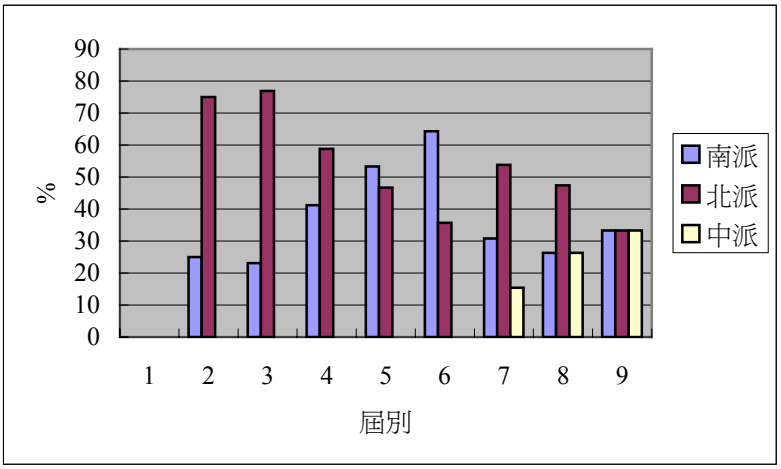
三大時的一九六〇年仍是以北派爲骨幹，只有黎筍、范雄與黎德壽三人是有南方背景，占 23%；其他的如胡志明、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維楨、黎清毅、黃文歡，甚至候補委員的文進勇及陳國環，都是北派人士，還是北派的天下（77%）。

不過不久越南共產黨便決定派遣北方幹部，支援在南方進行革命的「越共」，因而南派的勢力大張。然而在一九七六年越南統一後，四大隨即召開，屬於南派的政治局委員包括了黎筍、范雄、阮文靈、武志功，也包括了候補委員之武文杰與杜梅，共占 41%，而北派人士雖已有萎縮，但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維楨、黎清毅、陳國環、文進勇、黎文良、朱輝敏與素友等人，不只仍有 59% 的多數，也仍占了重要的位置。四大的政治局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南派人士的數量上升，是越南共產黨南北統一的表象。

圖 1　北中南三派委員在政治局之比例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表 3 統計而成。

一九八二年五大時由於越南經濟越發蕭條，民生困苦證明北方人士所熟悉那套史達林模式業已失敗，於是作向市場經濟傾斜的試驗，故有市場經濟經驗的南派人士在政治局的數量因而增加，黎筍、范雄、黎德壽、武志功、武文杰、杜梅、阮德心與童士元等南派人士都成爲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共占 53%；而北派人士如長征、范文同、文進勇、朱輝敏、素友、黎德英與阮基石，只占 47%。五大是越南共產黨歷史上首次由南派領先的屆別。

一九八六年六大時由於越南共產黨元老如黎筍、長征等人都先後逝世，而越南對市場經濟有更大的需求，決定進行革新政策，於是在政治局南派人士大幅增加，除阮文靈出任總書記外，政治局委員還包括了范雄、武志功、杜梅、武文杰、阮德心、童士元、陳春白、梅志壽等，占 64%。反而北派則只有黎德英、阮基石、阮昇平、段奎與陶維松等人，只占 36%。

但是革新政策也受到保守派的對抗與置疑，於是一九九一年七大時越南的政策也轉趨保守，因此南派的勢力下降，只有杜梅、武文杰、潘文凱與武珍志四位，占 30.77%。而杜梅之所以繼阮文靈出任總書記，是因爲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政治立場又稍向中間移動。北派人士則反而大增，有黎德英、陶維松、段奎、黎福壽、裴善吾與范世閱等人，占 53.85%。其中范世閱是因爲協助中央處理工人對地方領導不滿有功。此外七大時也出現了不屬於兩派的中間溫和派，其中尤以當時的國會主席農德孟與阮德平爲代表，占 15.38%，發揮平衡南北兩派的作用。農德孟之所以上台，是因爲越南的少數民族也出現不安現象，農氏的上台，一方面是其當國會民族委員會主席任內處理的功勞，他方面是因爲農氏是岱依（Tay）族人，具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對少數民族有安定的作用。[29]

然而越南的革新政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再加上南北兩派各有損傷，如在六大時主管意識形態的陳春白，便因爲激烈主張自由化的言論，而遭保守派於七大前罷黜；而陳春白原本一直培養的南派大將阮河藩、北派大將之陶維松等在八大開會前便下馬（梁錦文：1998：14-34）。一九九六年八大時兩派相較仍然是北派爲多（占 47.37%），代表人物爲黎德英、黎可鏢、段奎、范文茶、阮文安、黎春松、黎明鄉與范世閱等人。主張革新的南派如武文杰、潘文凱、張晉創及阮晉勇等人出任政治局委員，占 21.05%。中間溫和派則有杜梅、農德孟、阮孟琴、阮德平、陳德良以及阮氏春美等人，占 31.58%。然北派因爭取總書記一職而有所分裂，如黎可鏢、段奎以及阮文安三人先後相爭導致勢力下降，相反南派由於武文杰業先指定潘文凱爲其接班人，其他南派人士亦無其資歷，因此較爲團結而力量可與北派抗衡。

八大原本要換屆，但是由於總書記一職競爭嚴重，越南共產黨只好將杜梅、黎德英與武文杰三位元老留任，直至一九九六年年底時黎可鏢出任總書記，三人才退休。所以二〇〇一年九大是確立換屆的時候，與八大相比，只有農德孟、陳德良、潘文凱、阮晉勇、黎明鄉、范文茶六人是八大政治局委員。作爲總書記的黎可鏢卻因對中共過份友好、其屬下人士貪污等事提前退休。政治局委員屬南派的以總理潘文凱、阮明哲、阮晉勇與張晉創爲首，北派的則以黎明鄉、阮富椿、黎鴻英、范文茶與陳定環爲代表。

[29] 此外另有說法是農德孟爲胡志明之私生子，甚至曾有澳洲記者訪問農氏時提及此事，但農氏不置可否（Nichols, 2001: 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間溫和派如農德孟、陳德良、潘演、阮文安等人反而是最大贏家，也是作爲平衡二派的人物。而阮文安由於與前總書記黎可錂之爭，反向南派靠攏，其他人士則派系屬性仍待觀察。

結　論

越南共產黨政治局是越南政治最重要的機構，是所有決策的核心所在。就越南憲法而言，除了一九四六年第一次憲法外，其他三次憲法都將越南共產黨置於領導地位，其中尤以一九八〇年憲法的第四條爲最，一九九二年憲法第四條雖有稍微修改，但共產黨在越南憲法的地位仍是不能挑戰的。

既然越南共產黨在憲法上有其一定的地位，而政治局又是其決策核心，因此越南共產黨政治局是越南政治的主要決策核心，乃是無庸置疑的。根據越南共產黨黨章的規定，由黨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有 7～19 人，三大至五大時有候補委員 1～3 人，但是自六大以後便不再設候補委員。

從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而言，總書記、國家主席與總理必定是政治局委員，甚至是常委。國會主席則時而躋身政治局委員，時而被排在外。而國防、外交、公安與代表經濟體系的計畫委員會主任四位部長級人士，則也是政治局委員的常客。但是他們的排名時因該部的地位升降而有所不同。

至於黨方的人士，主管意識形態者常爲政治局委員。一九七六年越南統一以後，越南共產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與中央民運委員會兩位主任也是政治局的委員。至於中央對外委員會現任主任則從未任政治局委員。爲因應「革新」政策以來所衍生的經濟問題與經濟犯罪，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與中央檢察委員會主任皆爲委員。

自統一後，地方首長如河內市與胡志明市的黨委書記或人民委員會主席（市長）也常躋身政治局，其後更加上峴港者，形成北中南三大城市的代表，也延續了越南傳統北中南圻鼎足而三的均勢安排。

從出身背景而言，國防、公安、外交與經濟四大體系是政治局委員的主要來源。在一九五一年二大至一九八二年五大之間，因爲三次越南戰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關係，國防體系的委員偏多，但一九八六年六大以後，反而是公安及經濟兩大體系上升。在國防體系中，二大是第一次越南戰爭中的抗法將領爲主，而三大至五大則以抗美將領爲主，六大以後則是以入柬將領爲主。

其實公安與國防常是互換的，但是一九八二年以前的將領多是戰爭的指揮官，但一九八二年以後則以軍中政治部的將領爲主，可見公安體系的上升。

經濟體系也有不少變化，從主張中共式土地改革的長征，而至史達林模式的黎清毅，最後到主張市場機能的阮文靈、武文杰、潘文凱等人，雖然都是出身自經濟體系，但政策都不太相同。

與此類似的便是外交體系，早期是以與蘇聯及中共關係良好之外交官爲主，但是自從黃文歡等親中派被整肅後，只有親蘇的外交官才能出任政治局委員，到了革新時期，則是以傾向向世界開放的外交官出任政治局委員。

從地域之分佈而言，一般而言，北派因長期處在革命的經驗中，較重視正統共產主義的傳統，而南派則因曾有市場經濟的生活方式，較重視經濟開放的革新政策。二大至四大時屬於北派的政治局委員較多。直至一九七六年四大時由於要顯示統一的意義，南方人士才大幅加入，但也只有范雄與阮文靈二人爲正式委員，其他如杜梅及武文杰也只是候補委員而已。五大時南派委員超越了北派人士的人數，顯示南北統一後對南方的重視。南派人士真正掌權的是六大。然而在七大時因「革新」政策初期不只成效不彰，更衍生出脫離中央計畫經濟後之紊亂，北派也有反撲之勢。[30] 八大至九大越南政治局在南北兩派中，再以中間溫和派來加以平衡的傳統。

越南政治局是該國政治的神經中樞，是其政經政策的主要決策機關。從上述的分析而言，它的確甚具制度。由於越南共產黨是列寧政黨的體制，由總書記、國家主席與總理所構成的「三頭馬車」，成爲政治局成員，固爲因襲蘇聯共產黨的模式。但是越南政治局之似乎如此有制度，也有其歷史的因素所造成的。

越南在胡志明領導期間，由於建國的需要，一切以「胡志明傳奇」（The

[30] 當時主管經濟改革的副總理陳方（Trần Phương）等人也因此而下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egacy of Ho Chi Minh）爲號召，然而實質上胡志明的權威因「出賣潘佩珠事件」而在越南共產黨高層間大打折扣，反胡勢力支持長征予以對抗，胡志明爲求自保，重用剛從南返北的黎筍予以平衡，形成一大時的「均勢三角」。俟長征因土地改革政策失敗、權力不再後，胡志明也因身體狀況日漸失佳，又引入范文同作爲協助平衡黎筍之用，形成由黎筍、長征與范文同在三大時的另一個「均勢三角」，而胡志明則高居其上，進行形式上的統治。該「均勢三角」一直延續至六大以前，維時約廿六年，主要是由長征與黎筍對抗，而「事務主義者」的總理范文同則是扮演「平衡者」之角色。[31]

其實一九六九年胡志明逝世後，因沒有明確選定「接班人」，而當時亦無一人可以獨攬全局，共產越南也進入「集體領導時期」，是故前述的「均勢三角」必須延續，形成了「三頭馬車」的傳統。再加上傳統三圻之分，更加強該「三頭馬車」的正當性。

就職位與出身背景而言，除三頭馬車外，其實國防、公安、外交與作爲經濟代表的計畫委員會爲四大部會，爲該國主持大政的重要基礎，也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故而政治局委員大多出身其中，是容易理解的。

就地域的分佈而言，越南傳統上的三圻之分，以及其共產勢力之發展，業已如前述。一九七六年統一時，在其官方的說法並不是北越佔領南越，而是由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與南方推翻阮文紹政府、由阮友壽領導的臨時革命政府合組新政府，是故其後必須顯示「南北共治」的理念，南北二派的勢力始可平分秋色。八大以後中派也成爲前二者的平衡力量，加深了昔日三圻的分配方式。

總而言之，越南共產黨政治局是該國政經決策的中樞。其組成份子就職務而言，則是以總書記、國家主席與總理的「三頭馬車」爲基礎，再輔以外交、國防、公安與計畫委員會四大部會首長；黨務系統則以組織委員會與民運委員會爲主；再加上河內及胡志明市等地的地方首長組成。

就出身背景而言，也以國防、公安、外交與經濟體系出身爲最大宗。但因各時期的政策需要迥異，部會出身縱使相同，惟理念也南轅北轍。

[31] 「事務主義者」是毛澤東稱周恩來之形容詞，越南人士常將范文同與周氏媲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地理分佈而言，四大以前由於南方尚未統一，南派較弱；但自五大後則南北兩派分庭抗禮；至八大以後中派又加入成爲平衡者。

越南政治局委員不論是職務、出身背景以及地域分佈，一方面是基於蘇聯式體制的結果；他方也是有其歷史傳統與政治現實相互作用所產生，形成相當穩定的制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白石昌也著，吳瑞雲、田川雅子譯，1994，《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台北：月旦出版社。譯自《ベトナム：革命と建設のはざま》。東京市：東京大学。1993。

姚楠主編，1995，《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梁錦文，1998，〈越南「三頭馬南」之分析〉，《東南亞季刊》，3(3): 14-34。

陳重金（Trần Trọng Kim）著，戴可來譯，1992，《越南通史》（*Việt Nam Sử-Lược*），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輝燎（Trần Huy Liệu）著，范宏科、呂谷譯，1973 年，《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Lịch Sử Tám Mươi Năm Chống Pháp*），第一卷（*Quyển I*），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陳輝燎（Trần Huy Liệu）著，北京大學東語系越南語專業譯，1974a，《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Lịch Sử Tám Mươi Năm Chống Pháp*），第二卷（*Quyển II*），上冊（*Tập Thương*），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陳輝燎（Trần Huy Liệu）著，北京大學東語系越南語專業譯，1974b，《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Lịch Sử Tám Mươi Năm Chống Pháp*），第二卷（*Quyển II*），下冊（*Tập H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越南共產黨，1996，《越南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河內：世界出版社。

塞西爾・柯瑞（Cecil B. Currey）著，朱立熙譯，1999，《勝利，不惜一切代價：二十世紀軍事奇才武元甲傳》（*Victory at Any Cost: The Genius of Viet Nam's Gen. Vo Nguyen Giap*），台北：商業週刊出版社。

新民叢報社社員編，1908，《越南亡命客巢南子述越南亡國史》，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海：廣智書局。

二、日文部分

白石昌也編著，2000，《ベトナムの國家機構》，東京：明石書店。

石井米雄監修、櫻井由躬雄、桃米至朗編，1999，《ベトナムの事典》，東京：角川書店。

潘佩珠，1925，〈自判〉，內海三八郎著、千島英一、櫻井良樹編，1999，《ヴェトナム獨立運動家潘佩珠傳：日本・中國を驅けた拔革命家の生涯》，東京：芙蓉書房，頁 239-318。

三、西文部分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2001. *9th National Congress Documents*. Hà Nội: Thề Giới Publishers.

Duiker, William J. 1989.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Vietnam*.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Duiker, William J. 1996.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Durant, Walter. 1979. *Stalin and Co. the Politburo: The Men Who Run Russia*. Arden Library.

Esterline, John H. 1988. “Vietnam in 1987: Steps Toward Rejuvenation.” *Asian Survey* 28(1): 86-94.

Gelman, Harry. 1984. *The 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ent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uỳen, Kim Khánh. 1982.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1945*.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oiner, Charles A. 1990. “The Vietnam Communist Party Strives to Remain the ‘Only Force’.” *Asian Survey* 30(11): 1053-1065.

Le, Duan. 1994. “Some Problems of Cadres and Organization in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Le Duan Selected Writings, (1960-1975)*. Hà Nội: Thề Giới Publishers, 409-4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öwenhardt, John., James R. Ozinga and Erik van Ree. 1992.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Politbur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rr, David G. 1995. *Vietnam 1945: The Quest for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Williams, Edmund. 1983. "Vietnam in 1982: Onward into the Quagmire." *Asian Survey* 23(1): 62-7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RV. 2002. "Biographical Resume of Mr. Nguyen Tan Dung." http://www.mofa.gov.vn:8080/. (September 13).

Montesano, Michael J. 2005. "Vietnam in 2004: A Country Hanging in the Balance."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5,* eds. Chin Kin Wah and Daljit Singh. Singapore: ISEAS, 407-421.

Nguyễn, Khắc Viện. 1999. *Vietnam: A Long History.* Hà Nội: Thề Giới Publishers.

Nguyễn, Phú Trong. 2004. *Việt Nam on the Path of Renewal*. Hà Nội: Thề Giới Publishers.

Nguyen, Van Canh. 1983. *Vietnam under Communism, 1975-1982.*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ichols, Hans S. 2001. "Ho Chi Minh's Love Child." *Insight on the News* 17(20): 14-15.

Pham, David Lan. 2001a. *Vietnam History Dictionary* Vol.I. New York: First Book Library.

Pham, David Lan. 2001b. *Vietnam History Dictionary* Vol.II. New York: First Book Library.

Pham, Hong Linh. 1984. *Congresses and Plenum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 Nam.* http://star.vietnam. ttu.edu/. (July 19).

Pike, Douglas. 1966. *Viet Cong: the Organization and Technique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 Delhi: Atma Ram & Sons.

Pike, Douglas. 1982. "Vietnam."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2.*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35-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ike, Douglas. 1984. “Vietnam.”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4,*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80-286.

Pike, Douglas. 1985. “Vietnam.”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5,*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38-244.

Pike, Douglas. 1986. *PAVN: People’s Army of Vietnam.* Novata, CA: Presidio Press.

Rees, E. A., ed. 2004. *The Nature of Stalin’s Dictatorship, The Politburo, 1924-1953*.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Richburg, Keith B. 1987. “Vietnam Reshuffles Government; Changes Likely to Spur Reform; Thirteen Top Officials, Including Defense Minister, Are Ouste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pg. A.12.

Stern, Lewis M. 1993. *Renovating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Nguyen Van Linh and the Programme for Organization Reform, 1987-91*. Singapore: ISEAS.

Thai, Quang Trung. 1985.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Factionalism: An Essay on Ho Chi Minh’s Legacy.* Singapore: ISEAS.

Truong Chinh. 1994. “The Party Policy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mplementing the Land Reform: Report delieved 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Viet Nam Worker’s Party.” In *Truong Chinh Selected Writings*. Hà Nội: Thề Giới Publishers.

Tucker, Spencer C., ed. 1998.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Vietnam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CIA, 1966.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The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st Front in South Vietnam* 1603(66) Copy 78. (September 26).

Vasavakul, Thaveeporn. 1997. “Vietnam: The Third Wave of State 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7*, ed. Daljit Singh. Singapore: ISEAS.

Vietnam Economic Times. 2001. “Party Leadership.” *Vietnam Economi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imes 87(May): Appendix.

Womack, Brantly. 1997. “Vietnam in 1996: Reform Immobilism.” *Asian Survey* 37(1): 79-87.

四、越南文部分

Bộ Ngoại Giao Việt Nam. 2005a. “Các dân tộc trên lãnh thổ Việt Nam.” *http://www.mofa.gov.vn/vi/tt_vietnam/nr040810154926/.* (ngày 13- 08-2005)

Bộ Ngoại giao, Việt Nam. 2005b. “Danh sách các thành viên Chính phủ.” *http://www.mofa.gov.vn/tt_vietnam/nr040810155159/ns040901073303.* (August 15).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3. *Điều Lệ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III thông qua ngày 1-7-1996) http://www.cpv.org.vn/cpv/statutes/index.htm. (ngày 21-06-2003).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04. *Điều Lệ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X thông qua ngày 22-4-2001).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înh Trị Quốc Gia.

以上二項爲越南共產黨黨章。

Hiến pháp nước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Năm 1959). 2003. http://www.cpv.org.vn/vietnam/hp59.html. (ngày 21-06-2003).

Hiến pháp nước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Năm 1980). 2003. http://www.cpv.org.vn/vietnam/hp80.html. (ngày 21-06-2003).

Hiến pháp nước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Năm 1992). 2003. http://www.cpv.org.vn/vietnam/hp92.html. (ngày 21-06-2003).

以上三項爲越南不同時期的憲法。

Nguyễn Hữu Tri & Nguyễn Thị Phương Hồng. 2004. *Một số vấn đề Đổi Mới Tổ Chức Bộ Máy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înh Trị Quốc Gia.

Nguyễn Khải chủ biên. 1996. *Việt Nam 50 Nam trong Thế Giới Ngày Na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à Nộ.

Nguyễn Trọng Phúc chủ biên. 2003. *Tím Hiểu Lịch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Qua Các Đại Hội và Hội Nghị Trung Ương*.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Lao Động.

Quốc hội Nước Cộng hoà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2005. “Tiểu sử tóm tắt Chủ tịch Quốc hội Nước Cộng hoà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Nguyễn Văn An.” *http://www.na.gov.vn/vietnam/index.html*. (ngày 13-08-2005).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Văn Phòng Chinh Phủ. 2000. *Chinh Phủ Việt Nam, 1945-2000*.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Trịnh Thúc Huỳnh et al. 2004. *Ban Đối Ngoại Trung Ương 54 Năm: Xây Dựng và Trưởng Thành, 1949-200*3.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 the Politburo of CPV

Abraham K. M. Leong[*]

Abstrac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 in 1945, the Communist Party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CPV) has been the ruling part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before 1976). The Politburo (*Bộ Chính trị*) has been the core of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CPV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CPV's Second Congress in 1951. Studying the Politburo thus is valuable and allows us to analyz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trends of Vietnam's 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the records released by the CPV and materials from other sour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buil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for the Politburo of the CPV. First, the Politburo's status in Vietnam'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explored. Seco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olitburo is analyzed, with the focus on its members' careers within the state and the party. Third, the background of members and the 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 in selecting them are prob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emonstrating ho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bove factors, Vietnamese policies were made.

Key words: Vietnam, Communist Party, Politburo, Đổi Mới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mail: kmleong@ncn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